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

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

我， 奴隶和情人

(法) 雅恩·安德烈亚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本书必须读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我，奴隶与情人

[法国]雅恩·安德烈亚 著

蒋 燕 译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,奴隶与情人/(法)安德烈亚(Andrea, Y.)著;
蒋燕译. —北京:印刷工业出版社, 2001
(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)
ISBN 7-80000-404-X

I. 我… II. ①安…②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42790 号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87 字数:12000 千字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:001-500

ISBN 7-80000-404-X/T·13

定价:4500.00 元(全套四十卷)



内 容 简 介

雅恩·安德烈亚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奴隶、情人、永远的追随者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雅恩·安德烈亚永远说不尽、道不完、读不懂的情人。

一个内敛而默默无闻，一个古怪而声名显赫。

一个血气方刚，一个人老花黄。

他们之间上演着动人却永不结束的故事。

这是一场美丽的艳遇，还是一种绝妙的巧合？

这是一段离奇的爱情，还是一遭巨大的灾难？

本书以情人的身份、感人的笔触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。雅恩陪伴杜拉斯十六年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尊严，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和光明前途。

他得到了什么？快乐？幸福？恐怕更多的是无情的伤害和苦痛。杜拉斯乖戾、专横、任性，“雅恩，你是个十足的废物”“什么事都不干”杜拉斯如是说。

他图的是什么？金钱？名誉？恐怕更多的是埋没和打击。杜拉斯吝啬、刻薄、嫉妒，杜拉斯多次声明，“雅恩，你什么也不会得到”“在这里，你一无所有”。

他之所以心甘情愿做杜拉斯的奴隶、情人，是因为他太爱杜拉斯的书，爱她的每一本书；也因为他太爱杜拉斯这个人，爱她的智慧、善良和偶尔的天真。他的灵魂与肉

我，
奴隶与情人

体永远属于杜拉斯，他爱的太热烈、太疯狂，以致沦为爱情的囚徒、沦为情人的奴隶也在所不惜。

他的唯一回报是一种改变，一种身份的改变，一种位置的改变，一种从剧中人到剧作者的改变，即由杜拉斯作品中的人变为作者，而杜拉斯则变为其作品中的人。

这是囚徒的获释过程，也是奴隶的解放过程。

杜拉斯一生扑朔迷离，黄昏时节更是隐秘而神奇，雅恩是杜拉斯晚年唯一的、最好的解读者，我们怎样更好地解读杜拉斯，解读雅恩呢？《我，奴隶与情人》以独特的视角、回忆的方式展示了二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因而独具魅力。

本书是雅恩的第二部作品，1999年出版，并入围法国五大文学奖中的两个——美第契奖和妇女文学奖，畅销法国。读罢此书，你会觉得获此殊荣当之无愧。

情人眼里看情人，百看不厌。

一本奇异的书：隐秘掠过纸面……细腻而真实地描写了他们共同的生活。

——法国《新观察家》

他以杜拉斯的方式进行写作，大胆而隐晦的笔触，自然而毫不矫情的语言……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好书。

——法国《快报》周刊



我想说一说 1980 年夏到 1996 年 3 月 3 日这十六年当中的事。说一说我跟她一起生活的那些岁月。

我说的是“她”。我总是很难说出她的名字。我没有办法说出她的名字。除非写在纸上。我从来不曾以“你”称呼她。有时，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，希望我以“你”称她，希望我叫她的名字。但我没法叫出来，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。对她来说，这是一种痛苦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然而，我别无他法，我想，我可能在不经意间以“你”叫过她两三回。我发现她露出了笑容。

孩子般的笑容。一种发自肺腑的欢悦。要是我自始至终都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！

我叫不出她的名字，我想是因为我首先读到这个名字，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。这个名字立刻迷住了我。这个笔名。这个化名。这个作者的名子。总而言之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。

事情就是如此。

华、艺术品、书籍、佳肴、酒、言论、装饰、幻想，也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深入各个角落。似乎全世界的空谈家们，都聚集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，慷慨激昂地嚷着。当然有真理，也有奇谈怪论。他们身边围满了吸引来的闲人、美学爱好者、终身革命家或一时的造反派。他们就是这样，每天晚上都举行着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、规模最大且引人注目的智力集市。来自不同政体、王国的臣们、外交家们，在花团锦簇的布瓦区的宴会上济济一堂。刚刚创建的联合国，选择了凯道赛的时钟厅，作为第一次议会的会址，也就是在这儿，她庄重地向人类许下了要开创一个幸福时代的诺言。

女人们已经开始裁短了裙子，剪掉了长发，从路易-菲利浦时代就营建起来的防御工事，突然变窄小了。人们铲倒了高墙，填平了壕沟，城区将向所有的贫民区扩展，滚滚而来的砖和巨浪般驶来的水泥淹没了原来林子里的教堂。

大战刚刚胜利结束，共和国就已把一位法国最彬彬有礼的人士选为她的第一任总统。于是法兰西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，沉浸到了无节制的欢庆之中。

巴黎从来也没像这时成为一个寻猎如此成功的社会。在这里，至少有一万个经常更替的分掌政权、财富，维护风雅及驾驭优秀的人才。当时有崇尚珍珠的风气，因此这些人几乎可以同珍珠相媲美，珍珠就是这些人的象征。珍珠有真假之别，这些人也有有无教养之分。有的人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失去了光泽，而有的人却在市场上价值与日俱增。这一万人中没有一个人像宝石那样洁白澄亮，光彩耀

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（我现在还是这样）之间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合。在她和我之间，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，雅恩之间，有一种巧合。

读她的书是孤独的。我不能跟其他人谈她的书。我怕谈她的书。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？要是别人不喜欢，或不怎么喜欢，或喜欢得不够，那怎么办？所以，我宁愿沉默不语，把话埋在心里，继续读她的书。一个人读，躲起来读，羞耻地读。

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，我已经想保护她了。她已经跟我在一起，但她自己还不知道。我是一个读者。第一读者，因为我喜欢她写的一切文字，全部文字，无所保留。“杜拉斯”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。我全身心地爱它。它恰巧落在我头上。我再也没有离开她，我无法与她分离，永远也不能，她也同样。

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，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。

1975年，卡昂的“吕克斯”电影院在放《印度之歌》。电影结束后，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。当时，导演习惯前来与公众交谈。必须组织一些讨论。我想买一大束鲜花，但又不敢买。我害羞。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？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？我没有买花。我口袋里揣着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。我想请她签个名。灯光重新亮了起来。她出现了，她身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这件栗色的皮背心，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，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。那条裙子她已穿了二十年。那件背心，她后来给我穿了，是借给我穿的。那件背心做工精细，由软皮制成的。

“雅恩，我不能没有它，我不能把它给你。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。我很乐意借你几天，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。”

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。

我坐在第一排，与她面对面。我提了一个问题，我弄糊涂了。她笑了，帮助我，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并且作了回答。我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。我什么都听不见。我看到她站在那里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，我都替她害怕。怕人们讨厌这部电影，讨厌《印度之歌》。好像这有可能似的，好像这事会发生一样，好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。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。对她来说，这不只是一部电影。她喜欢这部电影，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。她疯狂的爱上了这部电影，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，爱上了德尔费娜·塞瑞格，爱上了安娜-玛丽·斯特莱泰的红裙子，爱上了卡洛斯·达里西奥的音乐。她肯定喜欢《印度之歌》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，印度边缘那座破旧的宫殿。加尔各答就在这里，在法国。我看见她了，我看见她了。她担心别人破坏这些形象、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。我害怕但我想献花给她，但愿大家都沉默不语。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。看《印度之歌》。就我们两个人。

问答结束了。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。我掏出《摧毁吧，她说》请她签名。她签了。我对她说：“我想与您通信。”她把她在巴黎的地址给了我。她说：“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。”然后又说：“我有点口渴。我想喝一杯啤酒。”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。她喝了一杯啤酒，然后说：“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。”几个年轻人陪着她。她上了一辆小汽车，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。

她把我留在卡昂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做“出发”的小酒吧里。我和其他人在一起，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。我口袋里有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，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：巴黎，第六区，圣泊努瓦路五号。

故事开始了。次日，我就写了一封信。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。我一直在写。信很短，每天写好几封。有时，我几天不写，然后又开始写。我刚刚写好了一封信，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，我立刻把信寄走。我不愿留着它。我给她寄了几箱信。我不期望回信。没有回信可等。我什么都不等。但我在等待。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。我并不认识那条马路，我并不熟悉那个套间。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看了没有。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。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。那个女人，《印度之歌》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。

让娜·莫拉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。我买了唱片。我别的不听，只听这张唱片。只听莫罗的歌声和卡洛斯·达里西奥的探戈。我如痴如醉。我也跟着唱。我不等待她的回信，然而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。希望她会回，希望她会写信给我。没有回答。没有。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，意思意思也好，比如说“感谢您”，“我收到您的信非常高兴”之类。没有。一点回音也没有。写几句亲切的话，礼貌的话，这不符合她的风格。决不。我应该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我读了她的书。我让自己天真的这样想：终究会有一天，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。

我继续读她的书。其他书我一概不读，我放弃了一切

别的活动。我再也不去上课，不做任何事情。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。我换了套间，现在跟贝内蒂科特·L和帕特瑞克·W住在卡昂的欧仁-布丹街，面对着墓地。帕特瑞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蒂科特，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。她和弗兰克·L一起准备文科教师的资格考试。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兰克·L。我们讨厌他，他也不喜欢我们。贝内蒂科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“穆卡”喝强身的杜松子酒，听朱里奥·伊克莱西雅的《你也没有改变》和阿达莫的《下雪了，你今晚不来》了。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，非常用功。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，找了丈夫，有了孩子和一幢体面的房子，在那期间，她不想再和我们见面，不想看到我们，也不想看到科里斯蒂娜和帕特瑞克。那个在我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，买了那本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的女人，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。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？她还会像从前那样爱我吗？为什么不？这不是没有可能？

我则继续写信。圣泊努瓦路五号。一直没有任何回音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后来，1980年，她寄给我一本《坐在走廊里的男人》。这是第一次碰到：我不怎么喜欢，就是说我看不明白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我很震惊，很落后。令人同情的天真汉。我不想弄懂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，我不想欺骗她。我不会。她马上就会觉察到的。我没有回信。我停止写信了。我收到了第二本书。书中附了几个字：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。您又改变了地址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没有再写信。

之后，我又收到了《黑夜号轮船》、《奥莱丽娅·斯泰

纳》和《否决之手》。

蓝色的封面，法国墨丘利出版社出的。我疯了，我喜欢得发疯。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《黑夜号轮船》。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。我去剧院看克洛德·雷基和比·奥吉埃、米歇尔·龙斯达尔、玛丽-弗朗士所演的那出戏。我回去将这部电影看了好几遍。诺伊利的情人们。我第一次去了圣泊努瓦路。我在五号前面经过。我怕与她相遇。遇到她怎么办呢？说什么好？

什么都没见到。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卡昂。

终于，我得到了消息，收到了她的一封信：“我病了，现在好多了，都是酗酒造成的，我好多了，我刚刚写完了《奥莱丽娅·斯泰纳》的电影剧本，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。”她没有说哪一段，也没有说是“巴黎的奥莱丽娅”还是《温哥华的奥莱丽娅》。

她给我这样写道：“我为您写了《奥莱丽娅·斯泰纳》这部东西。我并不认识您。我读了您所有的信。我都保存着呢！我好多了。我戒了酒。我要做这么一件事：拍电影。我将不那么孤单寂寞。

我又重新给她写信。每天写好几封。我疯了，我喝好多威士忌。贝内蒂科特差不多不再来套间了。帕特瑞克很痛苦，他很少回来了。他在的话，我们便喝一些酒。我写了些诗，一些短文。用向贝内蒂科特借来的旧打字机打的。我疯狂地爱上了这台灰色的机器。有几个晚上，我彻夜打字写文章。我想出了一个很不错的题目：美丽的痛苦。喝酒。我喝点“芝德拉”帮助睡眠。我睡到下午才起来，听《印度之歌》。我一个人呆在欧仁-布丹街的那个

我，
奴隶
与
情人

套间里。

有一天，贝内蒂科特对我说我应该走，离开这个套间。她说她兄弟要来卡昂，学医，要住在这里，住在我目前住的房间里。

我离开了。我找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。我随身带了一个铁箱，里面装着几本书。

后来，是的，我到了那里。1980年7月的一天，我打电话到特鲁维尔。我知道她在那儿。我每周都读她发表在《解放报》的专栏文章，她谈论波兰、格但斯克，谈论灰眼睛的孩子、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。我确信她在写我。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。

我打电话给她。我说：“我是雅恩。”她开口了，说了很长时间。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。我在卡昂的大邮局里打电话。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。她忘了时间。她说：“来特鲁维尔吧。这里离卡昂很近。我们一起喝一杯。”

1980年7月29日，我坐公共汽车去了特鲁维尔。公共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。我走在石板路上，经过黑岩楼。我什么都不看，蹬上大楼梯，从马路一侧在旅店前经过。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。我不敢看，不敢抬头。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，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，我不知道拿雨伞做什么。我走进电话亭，给她打电话。她说：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。我正在工作，一时无法脱身。”

两小时后，我又打电话给她。这时已是黄昏时分。她说：“还没完，七点钟左右再打电话给我。到浴场路去买

一瓶红酒。”她把杂货店的店名说得清清楚楚：那是特鲁维尔最棒的杂货店。她问：“您听清楚了吗？不会弄错吧？”我去了浴场路，找到那家杂货店，买了一瓶普通的波尔多红酒，然后走进黑岩楼的大厅。那时可能已临近七点。我仍然傻头傻脑地夹着那把雨伞。

“我在二楼住。您在走廊里不会找不到这里的，走到头。在大镜子的右边。”

我敲了门。她开了门，露出了微笑。她拥抱了我，说：“您知道，有门铃的。敲门不会有人听得见。”

我打开红酒。酒很差，软木塞的那种。她说。我听着。她说：“每星期写专栏文章真费劲，每次我都觉得自己无法写下去了。”我们喝着酒。她说。我在那里听着。我在黑岩楼的那个套间里。她对我说：“您来看，这里很不错。有两个浴室，其中有一个华丽得让人难以置信。布鲁斯特去卡布尔的大旅店之前，和他的祖母来过这里，住在临近海的那个套间。我喜欢靠院子的一边。整天都是大海，不分日夜，烦死了。”

我没有吭声。我听着。她说：“您来看最漂亮的東西：阳台。对面是油港洛阿弗尔。一到晚上，灯火通明。那艘大型客轮似乎驶向我们，其实它并没有动。我喜欢这阳台，这烟囱和那水晶般的灯光。”

不知不觉，一下子就十点钟了。她说：“您一定饿了，我却一点不饿。您去中心酒店吧，那里很不错。我把给《解放报》写的东西再看一遍。”

我不敢进中心酒店。我在特鲁维尔闲逛，从俱乐部走向海滨，走向鱼市场，大约十一点钟，我回去了。她问：

“怎么样？不错吧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没有座位了。”她笑了，说：“这个季节，在这个地方常常是这样子。好啦，我还有块冻鸡。”我吃了。她说：“不要浪费旅馆费了，而且，到处都满了。我儿子的房间现在没人住。他不在，您可以睡在那里。”那里有两张床。她说：“我们去翁弗洛尔转一转吧！我想让您一睹洛阿弗尔的美景。灯光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。”她开车，一辆“标致”104。她带我看了这一切。那是在晚上。她说什么我都说“是的”。

“这种景象我百看不厌。有一天，我会把它拍成电影，拍下所有这些灯光。”她说。

接着，她唱起歌来，麻雀，粉红色的生命。我也跟着唱起来。她说：“走调走得这么严重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来教您吧。”于是，我们俩一起唱起了《粉红色的生命》。

我们回到黑岩楼的大厅，坐在镜子对面的大扶手椅上，面对朝着大西洋的篱笆墙。这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厅。她想喝一杯酒，我上楼回套间去拿酒瓶。她说：“这是一个伟大的地方。这种安静，没致了。您在听吗？”我说的是。我们喝着酒。在这安静的大厅里可以听见我们喝酒的声音。我们上楼回到了套间。她给了我两张床单，拥抱了我。

我在这里。和她在一起。我留下了。我不和您分开了。我留下了。我和您关在这个浮在大海上面的套间里。我在您儿子的房间里睡，在第二张床上睡。您睡在院子那面的大房间里。很快，我也跟您一起睡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了。我们不分离了。我们一起喝酒。我留下了。我用打字机打给《解放报》写的专栏文章。您口述着。我担心

跟不上。我打字打得不熟练，用三个指头打。她笑了，说她从来没见过哪个人用两个指头打字打得这么快。我们写着那个灰眼睛的孩子和年轻的辅导员，写波兰、莫扎特之爱和这句老话：我早就爱上你了，永远，永远，我永远也不会把你忘记。我们一起喝酒，一起去翁弗洛尔，一起笑，一边唱“麻雀”。她说：“好多了，您走调走得不那么厉害了。您会唱好的。”

有时，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我在客厅里等，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。我望着高高的窗户和窗帘上褪色的玫瑰。窗帘已经被无数个夏天的阳光晒焦了。我什么都不干，盖上被子。

我等待着。

“什么都不干，到了这种地步，真让人难以置信。这也很不错。您以前也是如此吗？”

1980年9月，每周给《解放报》写的专栏文章由于夜出版社出版了。书名叫《80年夏》。她把书题献给我。从此，我就取了“雅恩·安德烈亚”这个名字。

我，
奴隶
与
情人



她把我父亲的姓去掉了，留下了名，雅恩，即让，让-巴蒂斯特。我的生日是6月24日。她加上了我母亲的名字：安德烈亚。她选择我母亲的名字，肯定是因为它与我父亲的名字元音重复的原因，都有个a，半谐音。她说：“有了这个名字，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大家都会记住这个名字的。任何人都不会忘记。”

她去掉了她父亲的姓：多拉迪尼，选了洛特-加龙省的杜拉斯村的村名。那地方距她父亲在帕尔塔扬的老屋很近。我们俩都是化名，笔名，假名。后来这些名字成了真名，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些名字，因为她启这些名字。正是她启这些名字，安排了它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。

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因为她给我取了名字，因为它被写在了一本书中：《80年夏》。

几个月后，她开始拍《阿加达》，一个兄妹之间的爱情故事。影片的全名叫做《阿加达和无限的阅读》。那也